

◀ (上接 14 版)

言中指出,“我有时听到犹太人指责波兰人故意不帮他们,……。尽管确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救助犹太人,但波兰人在占领条件下无法根本上改变犹太人的命运。……道德上也没有律令来要求一个凡夫俗子冒着自身和家庭生命危险来救他的邻居。……”90 年代,关于波兰人在大屠杀中发挥关键角色的旧成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

然后将后者赶进谷仓付之一炬,活活烧死。该书迫使波兰人不得不直面自身反犹历史和战时集体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罪责,并迅速引起波兰以及更广泛的西方舆论的关注和热议。一些波兰人将格罗斯的指控视为对波兰民族的“诽谤”和“污蔑”。波兰“国家记忆研究所”还就此开展调查,在被杀犹太居民数字以及纳粹德国对这一屠杀事件的卷入程度等方面提出异议,但并未推翻波兰人是这

引发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敌意。凯尔采许多被杀者与苏联秘密安全部队存在着紧密关联,甚至穿着苏联安全部队的制服。后一种解释实际上反指犹太人战后遭受波兰人反犹暴行为“咎由自取”。这又揭开了波一犹关系中的另一个伤疤:即波兰人关于犹太人帮助苏联控制波兰在内的东欧各民族的成见和怨憎。在后冷战时期东欧国家普遍推行“转型正义”和“去苏联/俄罗斯化”的进程

“历史名声”,建构并维护一种在时空上一以贯之,能够提供自豪感的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由此成为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愿景。

欧盟内在的记忆规范裂痕

塑造和表现怎样的民族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不仅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也是地区国际政治的映像。曾经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日渐遥远模糊,而欧洲许多地区却正经受着“历史的报复”。充满悲情的受害者记忆或自我颂扬的民族英雄主义记忆在欧洲许多国家和民族沉渣泛起,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相互助推。

“漂白”历史的修正主义倾向并非波兰独有。中东欧国家尚未完成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历史进程,仍然致力于建构一种能给予国民“自豪感”的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这些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纪念活动等方式颂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哪怕这些英雄同时还曾对其他民族(如犹太人)犯下严重罪行。在斯洛伐克,一名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教士在全国受到纪念,人们积极参加纪念他的游行,或为他四处建纪念碑。波罗的海国家也刮起一股纪念本地“党卫队”的歪风。匈牙利、克罗地亚、乌克兰等国则纷纷颂扬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武装组织,或为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行为开脱罪责。2015 年,乌克兰还专门通过修正案,将否认二战期间乌克兰武装组织功绩的言行定性为“犯罪”。与此同时,那些急于转换门庭,实现快速“去共产主义化”和“去俄罗斯化”的国家,还致力于抹除苏联时代的“记忆遗迹”,如在公共场所拆除苏联领导人和苏军战士纪念碑、像等。围绕侵略罪责、爱国主义、纪念碑像存废等问题,这些国家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纷争不息,冲突不断。

历史记忆塑造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倾向,还往往影响到现实问题的舆论氛围和政策实践。发掘负面历史遗产,传播和煽动历史积怨,显然成了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对抗俄罗斯的重要工具。拆除苏联时期的纪念物,也往往成为许多中东欧国家抵御“俄罗斯威胁”的重要一环。将自身描绘成大国强权的受害者,或向德国重提二战旧账,显然有助于支持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并抵御“老欧洲”在财政自律、司法改革、安置难民等领域的外交压力。但历史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往

往为反犹、排犹言行的沉渣泛起大开方便之门。将一些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归于某种形式的“犹太阴谋论”,是当今一些欧洲极右翼势力惯用的策略。这种“犹太阴谋”具体可归于乔治·索罗斯,或者被视为来自某个强大的“罗斯柴尔德集团”。反犹憎恨言行在欧洲许多国家的泛滥,也已引起“反诽谤联盟”等犹太组织的焦虑。

欧盟将自身定义为“规范性权力”。法、德等欧盟核心成员国尤其长期以身示范,致力于维护和传播二战以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规范。长期以来,欧盟积极支持国际刑事院所代表的国际刑事司法普遍管辖权,对移民、难民和少数族裔群体实施宽松包容的政策,反对反犹主义和排外仇外言行,等等。这些规范确立的重要基础之一,就在于欧洲国家对于纳粹大屠杀和反犹主义历史罪责的深刻反思。承认和直面纳粹侵略和大屠杀历史罪责,使新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不再重演,内嵌于欧盟整体的社会政治规范结构之中,与其他相关规范形成有机关联。德国尤其因直面历史罪责而在国际舞台成为“规范性权力”的典范。

鉴于沉重的大屠杀历史包袱,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否定大屠杀或其他种族灭绝,公开表达反犹主义,不仅是一种违反欧盟“政治正确”标准的行为,在许多国家还会遭受刑罚之灾。2006 年,英国人戴维·欧文因在 1989 年否定毒气室的存在而在奥地利被捕判刑入狱三年。近年来,英国工党接连封杀甚至开除一些公然发布关于大屠杀历史或带有“反犹”倾向的“挑衅性”言论的党员。2016 年,伦敦前市长利文斯顿曾宣称“希特勒曾在 30 年代支持锡安主义”,结果被工党封杀至今。近期法国巴黎一名高龄大屠杀幸存者被暴徒杀害,引发了数千人上街游行示威。法国总统马克龙高调参加葬礼,并发表演说谴责反犹主义。土耳其长期反对将亚美尼亚大屠杀定义为“种族灭绝”,这是被“老欧洲”视为“非我属类”而迟迟不予接纳入盟的一个因素。

波兰等中东欧新入盟国家在大屠杀历史和反犹主义等方面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欧盟自由派精英所坚持的欧盟共同规范和价值观大相异趣。欧盟的自由主义记忆规范在那些国家明显“水土不服”。内在的记忆规范裂痕,凸显出欧盟扩大进程中内部凝“心”工程的严重滞后。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 以色列大屠杀历史学家伊斯雷尔·古特曼 (Israel Gutman)



▼ 原籍波兰的美国学者杨·格罗斯 (Jan T. Gross)



不少犹太学者的质疑。

但波、犹之间此种相互和解的势头在新世纪戛然而止,双方围绕波一犹关系和波兰人在大屠杀历史中角色的争论热点丛生,矛盾尖锐。原籍波兰的美国学者杨·格罗斯 (Jan T. Gross) 通常居于新纷争的中心。他所著的《邻人》(Neighbors, 2001)、《恐惧》(Fear, 2006)、《掘金热》(Golden Harvest, 2011) 等著述,史实清楚,话语尖锐,并侧重于一些极端个案,有以偏概全之嫌,在情感上很难让波兰民众接受。由此,波、犹之间一再围绕历史问题出现舆论风波,波一犹关系也形成一个下降的螺旋。

《邻人》一书致力于揭示犹太平民在战时 (1941 年 7 月) 的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 (Jedwabne) 遭受波兰人集体屠杀的历史真相。长期以来,波兰人认为德国占领者制造了这起屠杀。但该书基于大量的访谈和回忆录,提出犹太人的波兰“邻居”制造了这起屠杀。邻居们先殴打 1600 名犹太居民,

一事件主角的定论。

《恐惧》一书则将视线转向战后初期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许多犹太幸存者回到家乡,但仍然受到波兰人的反犹敌意和暴行。典型事例就是“凯尔采屠杀案”。1946 年 7 月 4 日,在波兰中部城市凯尔采 (Kielce),一群暴徒残酷杀害了 42 人,其中大多数为犹太人。在格罗斯看来,战后波兰人此类的反犹主义,很大程度出于他们对战时纳粹帮凶和屠杀犹太人的罪责被追究的担忧。针对格罗斯的历史叙事,波兰舆论界同样未能推翻历史事实,但提出了不同的归因。一种将之归因于波兰人担心犹太幸存者收回他们在战时占为己有的犹太人财产,这可以等同于匪盗行为,而非出于反犹主义。实际上,这确实是许多大屠杀幸存者战后试图重新回归家园时的现实遭遇。迄今为止,犹太人在东欧国家(重点为波兰)追索战前资产仍然阻力重重,纷争众多。另一种则将之归因为犹太人积极参与和协助苏军对波兰的占领,

中,“亲苏/俄”指控同样是一种充满历史悲情的强大话语,可以为反制犹太人提供道义高地。

《掘金热》则揭示了战后一些波兰人挖掘犹太死难者遗物,搜寻遗留黄金以致富的事迹。该著作再次揭示了一些波兰人借助犹太人受难而致富的不光彩一面。在 2015 年一篇发表于德国《世界报》的文章中,格罗斯甚至宣称,“波兰人杀的犹太人比德国人还多”。此言很快引发波兰政府的抗议和反制。2015 年 10 月,波兰政府以毁坏波兰“良好名声”为名,对格罗斯展开“诽谤罪”调查。接着,波兰总统杜达要求重估 1996 年授予格罗斯的荣誉勋章。

格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著述,解构了波兰人关于自身无辜、受害和英雄主义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叙事,并引发波、犹之间激烈论战和情感恶化。围绕二战历史问题的纷争,使波兰人在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中面临巨大的外部挑战。捍卫